

恩格斯

# 论权威

---

---

人民出版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恩 格 斯  
论 权 威

人 民 出 版 社

Friedrich Engels  
VON DER AUTORITÄT

恩 格 斯  
论 权 威

\*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四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0.5印张 7,000字

1973年9月第1版 197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17 每册0.05元

## 目 录

论权威.....1

### 附 录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摘录)

(1871年12月30日).....7

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摘录)

(1872年1月14[—15]日).....9

恩格斯致泰·库诺(摘录)

(1872年1月24日).....11

## 论 权 威

有些社会主义者近来开始了一次真正的十字军征讨，来反对他们称之为**权威原则**的东西。他们只要宣布这种或那种行为是**权威的**，就足以给它定罪了。这种简单化的方法竟被滥用到这种地步，以致必须比较详细地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但是，既然这两种说法都不好听，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又使服从的一方感到难堪，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否可以不要这种关系呢，我们能不能——在现代社会中既有的条件下——创造出另一种社会制度来，使这个权威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呢。

•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意大利《人民报》编辑恩·比尼亚米的请求为《共和国年鉴》这本文集写的。

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曾提出“打倒一切权威”，实现个人的完全“自治”等蛊惑人心的口号，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深刻地批判了否认一切权威、否认集中和纪律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在产生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就要“废除国家”这一思想的反科学、反革命实质。——编者注

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代替各个分散的生产者的小作坊的，是拥有庞大工厂的现代工业，在这种工厂中有数百个工人操纵着蒸汽发动的复杂机器；大路上的客运马车和货运马车已被铁路上的火车所代替，小型帆船和内海帆船已被轮船所代替。甚至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愈来愈占统治地位，它们正缓慢地但却一贯地使那些靠雇佣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资本家来代替小自耕农。可见，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

我们假定，社会革命推翻了现在以自己的权威支配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资本家。我们再完全按照反权威主义者的观点来假定，土地和劳动工具都成了那些使用它们的工人的集体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权威将会消失呢，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拿纺纱厂做例子罢。棉花至少要经过六道连续工序才会成为棉纱，并且这些工序大部分是在不同的车间进行的。其次，为了使机器不断运转，就需要工程

师照管蒸汽机，需要技师进行日常检修，需要许多工人把生产品由一个车间搬到另一个车间等等。所有这些劳动者——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么个人自治的蒸汽权威决定的时间开始和停止工作。所以，劳动者们首先必须商定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一经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在每个车间里，时时都会发生有关生产过程、材料分配等局部问题，要求马上解决，否则整个生产就会立刻停顿下来。不管这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是根据领导各该劳动部门的代表的决定来解决的呢，还是在可能情况下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示服从，这就是说，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任何雇用工人的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至少就劳动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sup>①</sup>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

---

<sup>①</sup> 恩格斯套用了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中《地狱篇》第三歌第三节地狱大门上的题词。——编者注

再拿铁路做例子。这里，无数人的合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合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在这里，活动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人能处理一切所属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表现得很明显的权威。不仅如此，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末，第一趟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但是，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先生们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开我们的玩笑。

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



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拚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

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也太少了吗？

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写于 1872 年 10 月—  
1873 年 3 月  
载于 1873 年 12 月《1874 年  
共和国年鉴》文集

原文是意大利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第 551—554 页

## 附 录

###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sup>①</sup>(摘录)

1871年12月30日于伦敦

……现在，我们的西班牙朋友们一定能看清楚，这些先生是怎样滥用“权威的”这个字眼的。巴枯宁派对什么一不如意，他们就说，这是权威的，以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作出了永远的判决。如果他们是工人，而不是资产者、新闻记者等等，或者，如果他们哪怕是稍微研究一下经济问题和现代工业的条件，那末他们就会知道，不强迫某些人接受别人的意志，也就是说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不论这是多数表决人的意志，还是作为领导机构的委员会的意志，或是一个人的意志，——这总是要强迫有不同意见的人接受

---

① 保·拉法格 (Lafargue, Paul 1842—1911) 是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西班牙通讯书记(1866—1869)，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编者注

的意志；然而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请试试看，在没有领导，也就是没有权威的情况下让巴塞罗纳的某个大工厂去进行生产！或者在不能肯定每一个工程师、司炉等等在正是需要的时候坚守自己岗位的情况下去管理铁路！我想知道一下，好样的巴枯宁是否会把自己肥胖的身躯托付给铁路列车，如果铁路是按照谁不愿意服从规章制度的权威，谁就可以不坚守自己岗位的原则去管理，而这种规章制度在任何社会中都比巴塞尔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条例<sup>①</sup>更加权威得多！所有这些娓娓动听的极端激进和极端革命的词句只是掩盖着思想的极其贫乏和对社会日常生活所处条件的根本无知。请试试看，在船上废除船员“所承认的一切权威”！……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397页

---

<sup>①</sup> 指1869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一些决议。为了加强国际总委员会的作用，加强纪律和集中制，这些决议扩大了总委员会的权限。这些决议在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之后载入组织条例，遭到巴枯宁派的攻击。——编者注

## 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sup>①</sup>(摘录)

1872年1月14[—15]日于伦敦

……起初，他们借口代表会议来同我们争吵，现在又攻击我们，原因是我们在执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有义务执行的决议。他们不承认总委员会的任何权威，即使这种权威是大家自愿承认的。我很想知道，如果没有这种权威(如他们所称呼的)，怎么对付得了托伦、杜朗或涅恰也夫<sup>②</sup>，又怎么能够用关于支部自治——象在通告中所说的那样——的华丽词藻阻止警探和叛徒的渗入。

---

① 卡·特尔察吉 (Terzaghi, Carlo 约生于1845年) 是意大利律师，都灵工人团体“无产者解放社”书记，1872年成为警探。他所办的《无产者报》(1872—1874年在都灵出版)袒护巴枯宁派，反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编者注

② 托伦 (Tolain, Henri-Louis 1828—1897) 是右派蒲鲁东主义者，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领导人之一；在巴黎公社时期转向凡尔赛分子一边，被开除出国际。

杜朗 (Durand, Gustav-Paul-Émile 生于1835年) 是法国警探，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在伦敦冒充流亡者；担任1871年法国人支部书记，同年被揭发并被开除出国际。

涅恰也夫 (Нечаев, 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иевич 1847—1882) 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拥护者。——编者注

当然，谁也不会否认支部有自治权，但是，如果联合会不把某些权力给予联合会委员会，并且最终给予总委员会，那末联合会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但是，您知道谁是这些**权威性的**决议的起草人和维护者吗？是总委员会的代表吗？根本不是。这些权威性的措施是由比利时的代表们提出的，而施维茨格贝耳们、吉约姆们<sup>①</sup>和巴枯宁们是**最热烈的维护者。事情就是这样。**

我认为，“权威”和集中这些字眼用得太滥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如果用炸弹和枪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就象在一切革命中所做的那样，那末，我认为，这就是在行使权威。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胜利以后，你们可以随意对待权威等等，但是，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向我说，权威和集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两种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末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末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末

---

<sup>①</sup> 施维茨格贝耳(Schwitzguébel, Adhémar 1844—1895)是巴枯宁主义者，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汝拉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1873年被开除出国际。

吉约姆(Guillaume, James 1844—1916)是巴枯宁主义者，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组织者之一，由于进行分裂活动在1872年被开除出国际。——编者注

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399页

## 恩格斯致泰·库诺<sup>①</sup>(摘录)

1872年1月24日于伦敦

……巴枯宁一直到1868年都是阴谋反对国际的，他在伯尔尼和平代表大会上遭到惨败<sup>②</sup>之后，加入了国际，并且立刻就开始在**国际内部**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巴枯宁有一种独特的理论——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他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就是说，不是由于社

---

① 泰·库诺(Cuno, Friedrich Theodor 1846—1934)是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工人协会米兰支部的组织者。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以后侨居美国，在那里参加国际的活动；以后参加美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为美国工人组织“劳动骑士团”的领导人之一。——编者注

② 指巴枯宁企图在1868年9月于伯尔尼举行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和平自由同盟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他起草的混乱不堪的社会主义纲领(“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实现阶级平等”，废除国家和继承权等等)。巴枯宁只拉拢了代表大会的少数参加者，在同盟的大多数人拒绝他的草案之后，他同少数人退出了和平同盟，另成立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公开的组织)，他的上述建议成了这个同盟的纲领的基础。——编者注

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都和我们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但是，在巴枯宁看来，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就不应当做出任何事情来维持国家的生命，即任何一种国家——不管是共和国，君主国等等——的生命。因此就应当**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背叛原则的。应当进行宣传，咒骂国家，组织起来，而当一切工人即大多数人都站到自己方面来了的时候，就撤销一切政权机关，废除国家，而代之以国际的组织。千年王国由以开始的这一伟大行动，就叫做**社会清算**。

这一切听起来都异常激进，而且简单得五分钟就能背熟，因此，巴枯宁的这套理论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很



快就受到了青年律师、医生以及其他空论家们的欢迎。但是，工人群众决不会让人叫自己相信：他们国内的公共的事情并不同时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按本性来说是有政治头脑的；任何要他们放弃政治的人都终究会被他们所唾弃。向工人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放弃政治，这就等于把他们推到传教士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怀抱里去。

根据巴枯宁的意见，既然国际的建立并不是为了进行政治斗争，而是为了在进行社会清算时能够立即代替旧的国家组织，所以国际应当尽可能地接近巴枯宁的未来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首先是不存在任何权威，因为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没有一个做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开动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这一点他们当然没有告诉我们。）多数对少数的权威也将终止。每一个人、每一个乡镇，都是自治的；但是，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

所以，国际也应当照这个样子来建立。每一个支部都是自治的，每一个支部中的每一个人也是自治的。巴塞尔决议真该死，它竟授予总委员会以一种危险的和可以败坏它自己的权威！即使这种权威是自愿授予